



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續二十二號）

梁園東

第二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質疑

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

「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第三，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以上我們把古史辨中的根本方法考查了一下，現在要看顧先生在他自己闢的所謂新途徑上發見的幾個方法和觀念了。這幾個方法和觀念，却是神奇妙術，我們應當敬謹考查才是！首先遇到的是胡適之先生介紹給我們，說是古史辨的「基本方法」，即是我們在前邊曾經提過的：

「凡是一件史事，應當看最先是怎樣的，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的。」

跟着這條基本方法來的，是在研究中發見的「三件事實」，也是上古史的原則，那是說：

『第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愈長，』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

經認清他裏邊是參有許多「傳說」成分，那就「應當」是看他什麼

84222

是真的史事，什麼是由傳說增添的成分，假若能把這個分清，那件史事的何者真何者偽，就立刻整理出來了，為什麼却要去看他的「變遷」呢？在顧先生意，莫非以為能知道了他的「變遷」，就可知道他的真偽？成分麼？這就神妙起來了！神農、黃帝、堯舜以至孔子的事，都有逐步逐步的變遷，顧先生早已「看」出來了，曾經決定了那幾件是「真」，那幾件是「偽」呢？豈顧先生之所以把他們的事完全決定是「偽」，就是由這樣「看變遷」而得的結論麼？好在顧先生在這一點倒謹慎了一點，自己又說：「在這上即不能知道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最早的狀況，」這倒也罷了！

但是照顧先生的做法，能不能看出「最早的狀況」，也是問題！顧先生的所謂「最早狀況」，必須解釋成是那件史事，在「最早傳說時期」的狀況，即不是傳說長久以後，滲進增添成分的狀況，這才「有用」。

但是有用的，但據顧先生的做法，却決不是這一點，顧先生所謂「最早狀況」，只是「最早看見的狀況」，比方堯舜的事蹟，在論語上是說『大哉堯之爲君也』，和『舜有臣五人』一類的話；在孟子上是記著堯舜禪讓的事，和舜的大孝事蹟；在堯典上又是堯舜的制度選舉的方法，用禹治水等事。在這三種書上都載堯舜的事，究竟那一些是「最早的狀況」呢？若按我們的解釋，那就很容易斷定，但按顧先生所謂「應當看」的做法，却就很容易斷定論語上所記的是最早狀況了，因為什麼

呢？惟一的理由，只是因為「早見」於論語，論語這本「書」，比孟子、堯典的時代在前，而論語以前的書上又沒見過堯舜的事，故論語上就是沒有理由相信他所記的堯舜事蹟，就必是堯舜傳說中，摻雜最少成分較純的「最早傳說狀況」，因為孟子堯典雖比論語時代較後，但並未後的很遠，尚在「同一時代」，關於堯舜的傳說，作與堯典上倒記著有些最早的傳說，而論語孟子上倒反是有些增添的成分，正好比現在孫中山的事蹟，民國初元作史書的人或許誤採了近代的文獻，把從前的革命說的很平常，民國十四年以後，另一個人採了近代的文獻，自然會說的親切熱鬧，這時孫文的事蹟，那個是最早狀況呢？顧先生只能以書生的時代先後斷定麼？

我終以為顧先生究竟是整理「古書」，不是整理「古史」，他所整理出來一件史事的「最早狀況」，實不足憑信！

如果這樣，顧先生這個「基本方法」已經完全不可用了，況且顧先生注意了史事的「變遷」，因史事的有變遷而認為「不可靠」，因其「不可靠」而更認定必出於「偽造」，這也是個一誤再誤不可救藥的錯誤！須知史事的有變遷，是因其多為「傳說」，「傳說」是會有變遷的，但傳說的變遷，最大的限度只可說他是「捕風捉影」，若竟說他是「有意作偽」，這就未免誣人太甚！誣人倒也不必在乎，只是既這樣看成他是「有意作偽」，那傳說的「真象」，能不能了解呢？不惟不能

了解，而且顧先生有這樣一個「成見」橫梗於心，也不打算了解去了！

比方堯舜「禪讓」的事，儒家的傳說固然是有炫染有變遷的，但這個「禪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就須很費力的研究去，而顧先生却就不再研究只很輕便地因他是「變遷」是「不可靠」的，就斷定他是儒家「偽造」的了！顧先生要說「偽造」，自然還有其他「證明」，不過他的證明充分與否，且莫管他，只是在「方法」上，顧先生這種發見却是非法的，即使證明十分有理由，也是要不着的！如是傳說是有變遷的，但要如顧先生的看法時，還是不要說變遷的好，只說傳說有炫染，有增添的成分，倒還不至引起顧先生的誤會！

顧先生的「基本方法」既如是，那跟着來的種種，自然都是有趣的了！現在我們且先看顧先生發見的那三件所謂「事實。」

(2) 事實的第一件是說『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愈長』！若單按字面上看，那就無論誰都不會懂，怎麼『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會「愈長」呢？若照這樣，那自漢以後到現在，在盤古氏以上，應當更有幾十套上上古史了！不過顧先生原意絕不是如此，他所謂『時代愈後，照歷史現象一想，只不過是個「同時代」或「同時期」在「同時期」有「年」代的先後罷了！但就是同時期的年代，也不能『年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愈長』！

因為一件事情的「傳說」必有一個極熱烈的時期，等到把這個時期一過，那個傳說就漸漸凝結固定下去。一件故事，流傳保有幾百年幾

千年儘管可以有，但是要時時增添「創造」，却絕不會有這個理由很

簡單，只是因為時代不同，生活環境都起了改變，對於前一時代的傳說，不惟沒有再行炫染的興趣，而且也絕沒有再炫染的能力，生活背景全不同，所造出來的當是另一件故事，絕不能再是那一件。比方宋江的故事，經過南宋和元代的傳說創造，到明初已大體固定不能再行擴大，明末唐伯虎等人的故事，儘管可以保存到現在，至多到清乾隆、明代的遺風遺俗已完全消滅以後，絕不能再炫染下去。古史的傳說，何獨不是如此？世界史上無論什麼民族，其對於最古史的神話傳說，大半都在有史以前即已完成，等到有了文字已入農學生活時期，他們思想活動的中心，已是另一些事情，絕不能再是古史。最顯明的一個例，如舊約上所保存的「創世」故事，那是遠從巴比倫有文字以前傳說下來的，等到猶太人到巴比倫學習的時代，大體上還相同。伊里亞特所保存的故事，吠陀中所保存的故事，世界上那有一個學者敢說，那只是伊里亞特和吠陀的作者「創作」的！他的傳說，在起先已經不知經過若干年代，到那時才記述下來罷了！這才是顯然的事實！

不料顧頡剛先生却對於「中國古史」觀察的很奇怪，說那些古史的傳說，不惟是從前沒有傳說過，而且只是在春秋戰國間這個「同時期」以內，僅因幾年幾十年或幾百年的「年代先後」不同，竟開始傳說出一部古史來！而且對於這樣傳說來的古史，究竟有無影子，究竟有無一點古代的經歷，也茫不加考察，更冒然認定那些古史，就完全都是

春秋戰國間傳說者「偽造」的「偽史」於是遂發見了「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愈長」的奇怪原則，這真是一種「發見」

我們且不論春秋戰國是不是開始傳說製造上古史的時期，只是春秋戰國間人，何以要「偽造」那些古史，這已經是不可解的謎了！而且假若那時所傳說的上古史，真是出於他們的「偽造」，那我倒不惟不嫌他們造的「偽」，反倒使我極佩服他們怎麼造的那麼「真」！這一點我知道顧先生絕不會和我起同一的感想，但是如果「中國上古史」真是出於春秋戰國間人的「創造」時，我的確不惟不覺着他們造的偽，實在覺得他們造的「太真」了！他們居然知道千餘年以前有過「洪水」，說他們住的地方都是水，他們在數百年幾有千年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之下，居然知道古代有過「禪讓」制度，他們安享了「宮室衣服」，閒着沒事，要想像宮室衣服是誰創的，假造一個黃帝罷了，不料居然更能「想見」未有宮室以前是「穴居」，且有「巢居」，他們的飲食早已是大鼎小簋烹調的極考究了，居然也能想見這們必用的「火」，最初是「鑽木」取來的，他們已保有許多「書」了，居然也能想見未有文字以前是「結繩計事」的，他們用「銅器」已厭煩，差不多都要用「鐵」了，居然會很驚異「以銅爲兵」的事，且更能知道以「弩石」爲矢」，過尤其可怪的是他們對於較近的堯舜，知道要敍他的宗譜，對於較遠的庖犧神農，却連個名字也不敢題，更其可怪的是時代較前的所造出來不很遠的古史，可疑的地方倒很多，而「時代愈後」了，所造

出來「愈長」的古史，反倒可採取的地方甚多，這種造偽的本領，能不教人佩服麼？這樣真切近情的造作，能不教人相信麼？

尤其不可了解的是顧先生所謂「時代愈後」其實在我們看，即如顧先生所定的造偽時期，從西周中葉（開始造禹）到秦初（造三皇完成），並沒有改換時代，只沒過過了幾百年，居然由契稷而禹，而堯舜，而黃帝，神農，而天皇，地皇，人皇，風起雲湧，一疊連「層累地」，造出十幾代極完備極豐富的上古史來，這種造偽的能力，也是突破世界上「傳說」的記錄的！從西周中葉到秦初，極多不過七百年光景，若照現代的時間看，十八世紀的末年和初年就有天壤之別，但是以古代看，一個石器時期經過了五千年都不能算長，這只有封建時期內一半多的七百年算什麼，這算着時代愈後麼？

所以顧先生「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愈長」這個假定，照普通歷史現象一想，幾乎是一個不可了解的怪物，但按顧先生的全體方法看來，這只是一個很平常的錯誤而已。

（3）顧先生發見的第二點，「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也和第一點一樣不能成立。在「同一時期」以內，一個傳說，較後的說法比較前的說法要放大一倍或幾倍，這是可能的。如果不在同一時期，「時代」是「後」了，那傳說的人物，絕不會再「放大」起來，要說「事實」，這才是「事實」！孔子本身是無疑的有神話成分，但是孔子的神話，極盛的時候恐怕只在西漢初，搜求遺書，獨尊儒家的前後，至

遠到東漢已絕不再有重大的變化——其他歷史人物的故事，也莫不類是。至於古史的傳說，到春秋戰國間，恐怕已不惟不是開始傳說「偽造」的時期，即連「放大」恐怕也超過時候了！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必拿春秋戰國的文化做說明，只要看看當時人們的風氣即可明白。孟子已謂『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可見那時絕不是個競尚矜奇立異的時代。鄒衍對於當時所知的時間空間上，是最能「放演」的人，已都稱他是「談天鄒衍」；莊子書裏邊「非事實」的記載很多，他也自己聲明『寓言十九』，可見當時的學者未必是以造偽騙人為務，當時的人也未必是專聽希奇故事的。在春秋時一個晉人讀史，誤把「己亥」讀成「三豕」，尚有人指出他的錯誤，並且有人專為此事到圖書館裏查去，可見那時人對於「考證辨偽」的精神，並不下於今人，怎麼能把古史製造那麼多，放演那麼大呢？

這還罷了，春秋時晉有乘，魯有春秋，是列國都已有史籍，周室更有像如老聃等終身做著的史官，可見那時不僅已有歷史觀念，而且「史官」「史書」對於記載歷史的組織，實在已是極完備，何以上古史還在傳說放大中呢？假定在那時的史書上所記着的「中國上古史」只到了契稷而止，契稷以前已再沒有，所以契稷以前的只好「偽造」，顧先生當然可以這樣說了！但是這個道理，就無論誰都不能理解，為什麼他們要增補這一篇上古史？嫌只到契稷太短，不多不少增到天皇、地皇、人皇，才算够長？而且他們的增也過於特別，不預先從極遠極遠的遠古提起，

只是增了一層又一層，「層累地」增上去，這種製造歷史的方法，也就再奇怪沒有了！據顧先生考查，西周以前的古史，到契稷以前已是「敷下土方」，上帝派下來平治水土的開天闢地之神了，極可奇怪的春秋戰國間人，對於開天闢地的禹以前，尚以為「別有天地」，無端又弄出兩個人來！那末我們的天地是禹開闢的，堯舜的天地又是誰開闢的呢？古氏即使再如顧君所說禹本來是神，西周中葉已變為人，所以很容易補上去，不覺着「別有天地」！如果這是眞的「事實」，我很慶幸自漢代以後中國人的古怪脾氣變了，不至再如西周中葉的人一樣，把開天闢地的神再變為一個人，如是「別有天地」、「別有天地」、「層累地」製造上去，到現在也未停止，那才麻煩呢！

這也罷了，最不幫忙顧君的是「時代愈後」，「愈放愈大」，誰知春秋戰國間傳說的古史，却並非「愈放愈大」！本來歷史人物由傳說變的神奇了，這是常有的事，但是春秋戰國間所保存的古史，却並非如此！禹的傳說，如果真如顧君解釋，最初是「神」，後來變為「人」，這豈不是反倒「縮小」了麼？堯舜的故事，在尙書中所記的，尚不如論語孟子中所包含的意義多，這也不算「放大」，而且對於堯舜除過孔孟一班人所舉的幾點美德外，並沒有傳出其他異跡，其他伏羲神農更沒有過什麼傳說放大的，黃帝的故事較多且神奇了，而且多出於漢人的小說，但

84226

辭故事一例推的話，他應當在很遠以前，到周秦間凝結固定了倒是有的。而且我們把春秋戰國間顧君所謂「層累地」造成的古史全體一看，較近的事蹟尙多，愈古事蹟愈少，顧君所謂「時代愈後」，「愈放愈大」，或者就是指這一點講麼？

(4) 顧君的第三件發見，我們在上面已經連帶批評過了，我們看

了他這一條，很可以明白顧君完全沒有整理上古史的「方法」，他所憑藉的，只是一種極危險的「捉摸」和「臆測」。顧君謂：「在這上雖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可見顧君顯然是爲「捉摸」這個「最早狀況」才費偌大的氣力，爲什麼說是「捉摸」？按顧君的做法，絕不能知道「傳說」的真的最早狀況，已如上述了，然而他的真意，却實在是要知道這樣的最早狀況，既沒有別的方法，只好從他那種做法上「捉摸」了。試看他

在方法上只是把「古書」整理清楚，而在結論上却妄想決定「古史」的真偽就可知。殊不知他更有一個根本誤點，他忘記了古代的書，都不是歷史書，只是些詩文集和語錄，誰能保定一件傳說先出的書上記了最早或同一演變的狀況呢？比方《楚辭》（在後）上記着的禹是神論語（在前）記著的禹是人，而《詩經》（更前）上所記的禹也是神，究竟那個邊是最早的狀況呢？詩經和國語都載着些商周初的事蹟，究竟那個上

是歷史書，是《禮記》是秦漢間的一部書，而《禮運》說：「昔者先王未

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檣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這是不是最早的情況呢？假若顧君能把書本拋開，不管出書時代的先後，而也能有方法分別出傳說的最早或後段，那才是真的整理上古史的方法，或以爲顧君的分別排比，並不是以出書的時代先後爲標準，我且請他讀古史辨第一冊去！

其實，我們看顧君最大的錯誤，就在他這種做法上，他迷信了「真書」「僞書」的分別，就把「真史僞史」和「真書僞書」發生了連帶關係，這不僅要失敗，而且是極謬誤的！須知研究歷史，是絕不能應用漢學家考據古書的方法的，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已講過。顧君因爲這種錯誤，所以他竟執著以爲「一件史事，應當看他最先是怎樣的，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的」，無論怎樣，這決不是研究歷史的方法。在顧先生眼中所謂「史事」，我們很不容易理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史事」應當是人的經歷，在某種環境下必會有的事實，這裏邊是有法則定律可尋的，那要得着從什麼最先最後來捉摸，我已說過，顧先生大概因爲研究歌謠太多了，把歷史都當成歌謠或民間故事看，歌謠自然沒有什麼依據，只好從他演變痕跡上以捉摸真象。但歷史那裏是這種樣子？古史固然多傳說，但對於人類必有經歷的傳說，那能和受時代反映出來的歌謠故事等量齊觀，無怪乎顧君要以上古史是可以由人隨便「層累地」造的了，原來只是造一隻故事，即跳的飛的怎麼不可以呢？

現在我們且勿再研究顧君的根本觀念，且看他所認定「層累地製

造的中國上古史」是怎樣的造法？顧先生的設想極其有趣而古怪，我願意就着他所舉的理由，一段一段指出來。不過千萬要注意我的批評也許完全不對，甚至墮入一個更大的荒謬中也說不定。因為要在百餘萬言的兩冊書中，整理出一個完全相反的見地，已是很難，而且顧先生的見地，已經過多少學者考查，差不多已成定論，要我來「一下」就能反出正確的「反案」，我認為這是未必能辦到的。所以我不預備顧先生經我的批評墮入荒謬，我却老老實實預備往荒謬裏掉！好在我若掉進去，顧先生自會拉我起來的！

二

顧先生所謂「層累地造成的中國上古史」，他已把他的系統完全立好，他說：

『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

顧先生研究中國上古史後，要有這樣的一個發見，本來未嘗不可，我們讀了詩經，很神氣的說『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下這樣一個判斷，有什麼不可以？但是若有人問『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除禹以外，還有沒有別的人或別的神呢？』那我們的詩經就要不着了，最沒危險是只好說『不知道』，不料我們的顧先生却不然，他的答案不是『不知道』，簡直就說『再沒有了』！於是引起麻煩，那個問的人就又很懷疑似的問：『那末向來說的堯、舜一般人是怎麼一回事呢？』假若是個

沒有多少讀書，只念過一本詩經的人，就不敢再說話。不料我們的顧先生讀的書多，肚裏早有主意，更大聲的說：『堯、舜是孔子一班人製造出來的！』這一答，一發使那個問的人糊塗甚且生氣，就揪著顧先生的鬍子，一定要問個底細，逼的顧先生沒有法子，只好解開書袋，掉出數十萬言還沒有完。但是我們記清這段公案，只是起於『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但除禹以外究竟還有沒有其他的人或神』這一個小小的問題。顧先生掉起書袋應該把這個問題解決才是，不料顧先生說了幾十萬言，對於這個問題却毫不管，只是證明他的主張：商周人怎樣製造禹，孔子以後怎樣製造堯、舜等等。讀者諸君，我們現在對於顧先生們那段公案，也不必管他，只要看看顧先生所謂『層累地造成的上古史』是怎樣造法，在這裏我們最要認清顧先生的『真意』。在每一層上當未被製造出以前，是再沒有的，要有了都是後來製造加上去的，如不是這樣，顧先生的發見就失掉意義，所以顧先生書中常稱那些製造者是『偽造』，是『偽史』，正是這個緣故！比方商周人最初只有契、稷，並沒有契稷以上的古史，到西周中葉才偽造出個禹來加上去，俱如此類。

(1) 按古代原始民族普通心理，商周民族可說他的始祖是『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周民族可說他的始祖是『厥初生民時惟姜嫄』，是商周民族已各知他們的祖先了，如是照普通情形，第一商周民族絕不會再弄一個不相干的人，無端加在他們祖宗的頭上做人王；第二，商

周各爲一民族，更絕不會共同承認一個毫無來歷的東西，做他們共同的人王！因爲原始民族，最重「氏族系統」，原始民族往往因爲氏族不同，一個氏族常把另一個氏族盡行屠殺，毫不餘留，稍後雖較好點，也要沒爲奴隸。如果禹若真無來歷，何以商民族竟不顧他的祖先的尊嚴，而要在祖先的頭上另加個拘束者？這已可奇怪了，尤其可怪的是周民族對於商民族征服後那樣毀謗，而却單單要把商民族所戴爲君主的，也要加在他們祖宗的頭上呢？

即使如顧君所說，禹或者是一個平水土的天神，爲商周民族所共戴。但是即使就是「天神」也絕不會「共戴」。原始民族因爲環境不同，生活不同，常是各有自己獨立的宗教信仰，以表示其爲獨立的氏族，即不論距離過遠，雖同在一個地帶，而氏族不同，宗教信仰也必不同。如是我們若同樣用推想，以爲商周民族有共同的天神，絕不如推想他們沒有這樣共同的天神爲可靠，這是照人類學上很容易斷定的。但不料顧君却竟說：『神話的普遍，惟有天神才能如此』！照這樣說來，不惟希臘人和希臘人應有共同的天神，即希臘人和埃及人和巴比倫人和波斯人都應有普遍的天神了！然而事實上却正相反，即連希臘人自己中因氏族不同，雅典和斯巴達所崇拜的神，尙完全不同，我們又那裏可以斷定不同氏族的商周，竟會有共同的天神呢？

(2) 以上的事實已經是不合原始民族的心理，已似乎不可能了。

不料據顧君的考查，那個問題中的禹，尙且不只是商周的物事，而乃更

是遠從商周時交通尚極少，種族觀念極歧視的長江流域來的！據顧君云：『楚辭天問對於鯀禹有很豐富的神話』，『越國自認爲禹後，奉宗禹，』『傳說中有禹會塗山的故事……塗山在今安徽。』因此可知禹不惟是商周兩個不同的民族，都會認爲共同的神，即連遠至長江中部，破古代各處天神的紀錄了！而且更可怪的是，長江流域各民族，雖到春秋，尙被認爲是蠻夷，極其輕視，偏偏早在商周初却會把一個生在蠻夷地方的東西，拿來當作自己民族的天神，甚至爲自己祖宗爲君主，又何況這個遠來的東西還有本是一條「蟲」的危險呢？這種不近情理的推想，似乎不必再舉其他證明。顧君也明明說：『古代開化的民族，只有中原一處，因此中原人很藐視四方半開化和未開化的民族，既是藐視，何肯把未開化地方的神當作自己的神呢？』中原人既開化，便自己連個神話也造不出來，必要從未開化地方去學，有是理麼？即使退一步講，就如顧君所說，因爲禹是平水土的神，各處都有平水土的需要，遂把平水土的神愈傳愈廣，那末創造世界，更是各處都需要的，埃及，希臘，波斯人早應共戴猶太的耶和華了！照普通情形，如果各處都有平水土的需要，那就應使各民族各創一個平水土的神才是，絕不會有普遍的天神！

(3) 以上幾點，還可說和顧君同樣落了推測的窠臼，且莫管他今再退一步，即如顧君所說，禹是南方神話的中心，漸漸傳至中原，但是這

個流傳的神速，也很可驚異，至少要比現代中國吸收歐美文化快多了！據顧君說：「商周間……越人奉禹爲祖先」到西周中葉宋人作長發，已經認爲是『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西周統共二百五十三年，中葉以一半計，距「商周間」也不過百八十年光景，越人的祖先竟會跑的這樣快，已到中原變成商周的神。豈那時中原人和越人的來往，較現在中國人和歐洲人的來往還要密切複雜麼？即使再退一步，如顧君在另一處講，長發作於春秋時，『中原民族自周昭王以後，因封建交戰而漸漸與南方民族交通。故穆王以來，始有禹名見於詩書，又特設后土之祀，得與周人的祖先後稷立於對等的地位。』如果這是真的，那商周人的虛懷若谷，沒有原始民族偏狹的民族觀念，真應佩服！一二百年中，從向認爲蠻夷的地方傳進一條蟲來，至使商人趕快把自己的祖先降低，說自己的商國乃是上帝叫那條蟲下來布土而成的，周人以赫赫天王的貴族，也趕快把自己祖宗撇開，說后稷原來是「續蟲之緒」的！不惟商周的虛懷若谷可佩服，即商周民族健忘的程度，亦很可驚異！越人奉禹爲祀是在商周間，可見那時商周民族不惟早已存在，而且早有國家，不料沒有過了二百年，居然就把自己的祖宗自己的神話忘記，只好再敬奉不遠千里而來的一條蟲！這種奇離現象，不知顧君竟怎樣想的出來。

(4) 所以我們看了顧君的意見，與其相信顧君所假定的系統，實不如相信舊史上原有的系統，倒還似乎近事實！我們並不是對這個有

什麼成見，禹的「出在西周間」和「出在商周以前」都無不可，只是要不違背歷史的普通現象才是，若照舊日的系統講，禹並不是到西周中葉才產生，實在已早在商周民族未發達以前，就已早在中原存在，而且已是傳說成很偉大的人，所以不論商民族或周民族，比較的開化在後，都要以他們的祖先來攀附，這是極可能的。因為中原人對於禹已經過夏、周三代的傳說，後來因戰爭把中原文化傳到南方「未開化」的地方了，遂更產出許多新的資料，這也是很合理的，至少也比硬把禹認爲是未開化地方的信仰，突然在二百年以內輸入開化地方，竟爲久已開化的民族也一致信仰，爲合理的多！這種假定至少是違反歷史現象公例的。至於禹的是人是神是蟲，那是另一問題，本篇不加討論。

三

商周以前沒有禹的傳說，直到西周中葉，才從蠻夷地方學來個禹，就冒然認爲是他們共同的君主，這種心理已經就不可思議了！不料奇怪的春秋戰國的歷史家，戴了一個帽子還不算，還要「層累地」往上造——契稷以上添了個禹，禹以上又添出兩個祖宗來，並且說這兩個祖宗是向以講話謹慎著名，「不語怪力亂神」的孔子造出來的！據顧君說：

『東周初年，只有禹，東周末年更有堯舜……於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堯舜了！』

堯舜的來歷，據顧君說是出自論語，「作論語時」，因爲某種必要，就又

84230

相尊「兩個道德最高功績最大的古王」，自從論語上造了這個謠言，『在論語之後，堯舜的事蹟偽造的完備了，於是有了堯典、臯陶謨、禹貢等篇出現。』

我們看了這種論調，若不是了解顧君是在誤解了康有為的「孔子託古改制說」，就絕不會明白顧君何以會產出這樣奇怪的見地。「託古改制說」應用的限度且不談他，只是由他的流弊，竟會產出顧君這樣見地時，那就連託古改制說也有改正的必要。

(1) 顧君這種見解的不會成立，首先就有幾個極淺近的道理，不曉得顧君和顧君的朋友就都能忽過第一，和孔子同時的歷史家很多，若早沒有堯舜的傳說，一般人沒有堯舜事蹟的觀念，那就以孔子的學說看，絕不會造一手遮盡天下目的謠言。第二，孔子在當時，甚至到孟子、荀子時，儒家學說並未佔有絕對勢力，如後世一樣可以說什麼是什麼，當時的人既對孔子學說不相信，豈能單單相信他所造的堯舜？第三，孔子差不多同時的墨子，對儒家學說一切都持異說，而墨子的稱道堯舜，雖和儒家取舍不同，而自謂「真堯舜」却是相同，這是早被韓非子說過的，何以孔子造偶像墨子就崇拜這個偶像呢？第四，自從論語上輕輕淡淡說了堯舜三言五語，孔子死後馬上就能有長篇大作的堯典、臯謨，以至於孟子左傳等上各家的種種記載出來，古人這種盲從的心理，已可駭異，而通同作弊的能力，也就十分可欽佩了！

(2) 這些道理且不要講，只是堯舜的事蹟，既大部分是孔子和孔

子的信徒造出來的，那末至少堯舜事蹟的主要部分，應當是儒家的理想，才有造謠的必要！顧君自然也看到這一點，所以說：『我意先有了禪讓的學說，而後有堯典、臯謨出來，當作禪讓的實證，禪讓之說，是儒家本了尊賢的主義鼓吹出來的。』這段話我們很不相信是極其好學深思的顧君說出來的！儒家貴貴親親，重宗法，重禮制，嚴尊卑，別上下，種種主要學說，倒不要「託古」來鼓吹，而只為一個「尊賢」，反倒費偌大氣力去鼓吹！況且儒家所謂「尊賢」，尚遠不如墨家的「尚賢」澈底，連墨家的「尚賢」，也只是「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罷了，這正是要破除儒家「貴貴親親」的貴族政治！儒家的尊賢，也只是「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至多是「舉賢才」罷了，遠沒有墨子「不黨父兄，不偏富貴」的精神，焉能以禪讓做「尊賢」的註腳？實在說起來，「禪讓」應當是和儒家的學說衝突，儒家「父作之，子述之」的思想，和「禪讓」的思想絕不同，何以儒家竟要拿堯舜來做反宣傳？顧君却說：『先有禪讓的學說，而後有堯典、臯謨。』請問除堯典以外，儒家禪讓的學說還在那裏？儒家既沒有禪讓的思想，也沒有主張禪讓的必要，甚至和他們「貴貴親親」的主張尚相反，請問孔子他們造這個大謠幹什麼呢？

(3) 我們且把這些擋過，試再看顧君的假定。假使堯舜是孔子一班人造出來的，但商民族已謂堯是他們的祖先，周民族已謂稷是他們的祖先，除堯稷以外，再往上數，至多已是禹，如顧君解釋是「敷下土」

的神了！如果這是真的，孔子便連幾句詩經都看不懂，竟不知道「敷下

土」是什麼意思，居然在開天闢地的神上邊，又添出兩個人王來。這種

作偽的膽量，也就很可驚異了！不過，顧君又說禹在長發上是神，到閼宮時就變爲人了！我不知長發距閼宮有多少年，大約不至有幾千百年

（即據顧君自己說：

『今按詩書中說及禹的九篇，閼宮長發作於春秋

時已無疑義。』）何以同一觀念，竟會變化到如此不同的地步？假使禹的觀念，真是由神變人，而且是春秋時代變的，就不信孔子便連這一件

小小事情也不知道，硬要使神來做兩個人的臣子。假使古代人的思想

特別，同樣在春秋時代作長發的人尙認禹是神，到閼宮時即刻就變爲

人，於是給禹頭上加兩個人自然可能，那末顧君天然應當有如下的推論：

『但治水原是禹的大功，口碑載道，堯舜奪不得的，沒有法子，只得請堯做了一時朦朧，由他任繇治水，等到九年，績用弗成，堯沒有辦法，就做了堯舜交替的關鍵，並爲舜舉禹的地步。』

看了這樣巧妙的解釋，使我們不禁起一種感想，孔子一班人，竟不是儒家的聖賢，直是謠言家的聖賢，當劉歆做七略時候，也很應當說『小說家者，流出於孔子之官』了。

禹本來是神，頭上還可任意添人，堯舜是人，頭上更可任意添人或神了！所以顧君「層累地」觀念告我們說：

四

『從戰國到西漢，偽史充分的創造，在堯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

『自從秦靈公於咸陽作上畤祭黃帝……經過了方士的鼓吹，於是黃帝立在堯舜之前了！』

『自從許行一班人指出了神農，於是神農又立在黃帝之前了！』

『自從易繫辭指出了庖犧氏，於是庖犧氏又立在神農之前了！』

『自從李斯一輩人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於是又有天皇，地皇，人皇更立在庖犧氏之前了！』

這樣一直到漢代，

『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傳了過來，於是盤古成了開天闢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

『偽史的創造，』從春秋起直到漢代，自漢代以後，製造偽史的工作，才算停止，盤古氏上邊沒有再加出更古的帝王或天神來，於是中國的古史才算完成！

顧君這幾層歷史造法，不如上兩層有趣，我們也可省事點。

（1）秦靈公作上時祭「黃帝」固然是事實，但方士們爲何要把這秦國的「黃帝」抬在堯舜之前，就絕不可解。按文化傳播普通的情形，若是文化相等的兩個民族，常是被征服者承受征服者的文化，（如秦統一六國後以秦人的文字刑法等變成中國的文化），若文化不相等，多是較低的服從較高的，春秋戰國間秦人文化不惟不高於中原，

而且常被視為戎狄，自秦靈公祀黃帝，也是再經一百多年才征服了六國，在這中間秦人的黃帝怎麼跑到六國變成中原人祖宗的祖宗呢？且

拿左傳來說，左傳上記着的黃帝並不是很幼稚的，如說黃帝氏「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遇黃帝戰於版泉之兆」，都是內容很豐富的話。左傳著作的年代固然有問題，但是究竟和秦靈公的關係怎樣？如果在前，那更不用說了，如果在後，後多少？即使後到秦始皇時，秦國的文化有沒有在這期間普遍出來的可能？何況國語國策幾部顯然是戰國間的書，都記着黃帝，那裏像是在幾十年中由方士從秦國搬來又賣到這些學者們的貨物呢？

但是退一步說，即使這些可能，而「黃帝」在秦國所祀的神裏邊地位並不高，秦國主要的神是「白帝」，秦哀公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後來秦文公夢見「黃蛇」，問於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而秦文公因此也是祠「白帝」，到秦獻公時因天雨食，也祀白帝，由此可知秦人向只祠白帝認為最尊，除白帝外，只奉宣公祠「青帝」，秦靈公祠「黃帝」「炎帝」（當係赤帝），當時的方士，何以不鼓吹秦國主要的神白帝，而偏看上黃帝呢？萬一秦國的主神不願有傳佈各地的必要理由時，那當時左傳國語國策上邊說的那樣確實的黃帝，不見得一定就是秦國的「黃帝」。

(2) 上古史「層累地」造到第四層到了神農氏，原來只是因為

許行曾經指出做教主，遂能立在黃帝之前，這個可能的程度恐怕更少。

禹和黃帝還勉強可說是一大民族的神話，能傳佈各地，堯舜的成立也可說是二大學派的宣傳，相當時期以後引起人的相信，至於許行，人既不爲當時所重，學說不久亦消滅再無繼續，何以秦漢間的人偏偏會想起他所偽造的教主，爲之立在黃帝之前呢？若照這樣，莊子的寓言最多，何以莊子所造的人物就都那樣不幸，都未入選也登極了呢？況且孟子上明明載着「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是許行爲神農之言呢？還是神農爲許行所造呢？假若歷來真無神農傳說，只是由於許行「創造」奉爲教主，孟子一班人就會毫不猶疑地相信真有神農，這也未免太容易了。

(3) 易繫辭傳的庖犧氏，李斯一班人的天皇、地皇、泰皇，可惜顧君沒有指出他是怎樣來的？若只以爲是做繫辭傳的人和李斯各自「創造」的，正如主張堯舜是孔子「創造」的，神農是許行「創造」的一樣，我真不明白顧君的勇氣竟這樣異於常態的人！其實我們對於古代的歷史儘管可以百二十分的懷疑，但是怎麼可以那樣「懷疑」古代的見解，而又這樣「相信」自己的見解？因爲我們翻編兩冊古史辨，並找不到顧君一點「方法」或「證明」使我們了然於繫辭傳以前的確沒有庖犧氏的傳說，李斯以前也沒有過天皇、地皇、泰皇的傳說，假使我們就原諒顧君一點，替顧君改正辭句上的錯誤，不可說「創造」，只

不多不少，每在後一期的傳說，必是前一層的歷史？「繫辭傳時期」就不該「創造」一個黃帝到堯舜間的帝王，偏要在神農氏以上好好的

歷史不研究，却來「捉摸」這些無聊事，怪不得顧君「生活過忙」。

至於盤古氏的來歷，是到漢代交通了苗族，剽竊上苗人的槃瓠化來的，這話不創自顧君，說的人很多，也頗可相信。但是我們應注意，在這裏應相信的至多只是漢人盤古和苗人槃瓠的「或有」關係罷了！至於怎樣發生的關係？那還得另考查，絕不應斷定就是到漢代才從苗族學來的別的不說，就如秦漢間和巴蜀的關係，較和苗族的關係更密切，爲

什麼巴蜀蠶蠻杜鵑的神話，就不被學着呢？假使盤古的「名稱」——要注意只是名稱——真是從苗族化來，其關係也絕不能如顧君所說的那樣簡單，下一個「傳」字就可解決。

五

總而言之，顧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這種觀念，既不是用正確的方法發見，也沒有證明的確當理由，在我看完全是一種「臆測」。這是一種「捉摸」以好學深思的顧君，所以竟弄成這樣，或是爲「疑古」的成見所蔽，或是「歌謠史觀」的結果。但是不論怎樣，即使顧君的做法萬一有不對，但我亦以爲「中國上古史」被顧君這一顆「煞星」給他這一番「无妄之災」，雖然是極其冤枉，但也許從此自振，比較清明起來，也說不定。然而顧君若真要替中國上古史幫忙，在我淺陋的意見，以爲那種「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觀念，似乎或者也許應當，

84233

非去掉不可！我反正預備往荒謬裏掉，對於這個觀念，爽性再總述一些意見，也許無妨！

第一，無論什麼地方或時代的民族，敍述他們的歷史，必是先敍其淵源所自，絕沒有先說一段，再「層累地」往上加的。如果春秋戰國間人不作歷史則已，如已稍有歷史觀念，他們應當早已有了遠古史，絕要不着層層往上補，這既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假若說中國古代民族複雜，各家的歷史傳說不同，是民族混合以後，兼採各家之長加上去的。但是如果這樣，也照樣不可能。因爲

第二，一種古代民族，商也好周也好，若已各有歷史，各已創出其祖先所有的神話（自然是應如此），那就絕不會再把別人的祖先，拉來放在自己祖先的頭上，作祖先的祖先！這種拉住別人叫親爹的脾氣，如今人不肯做，古代人尤不肯做。古代注重氏族系統，注重宗法的社會，絕對沒有這回事。若說不是他們自己加，是別人替他加的，但如商頌周頌大雅等，又都是他們自己做的。

第三，萬一說一種民族的神話沒有推到遠古，沒有做到家，見了別的民族更古的傳說就搬來加上去，這或者可能。但如顧君所說，連古代認爲蠻夷戎狄的越人秦人苗族巴蜀，都有開天闢地的祖先或神話，以文明人自居的中原人，他們沒有完全的歷史記載還可以，若說連歷史的傳說也沒有，必須抄襲人的，這就未必是事實了。

第四，萬一再說是黃河流域古代的傳說雖有，因各民族競爭把更古

84234 的民族消滅而「失傳」了，只好借用人的，這也容或有之。但是黃河流域更古的民族雖可不說，即以夏商論，其遺族制度到春秋時尚有存者，何以他們的神話就會完全消滅呢？即不論夏商只以周說，自陝西入主中國幾乎已有千年，何以便連傳說都沒有而要借用，或全憑新的創造呢？況且傳說的保存，並不是非賴文字記載不可，如苗越秦蜀他們的記載更幼稚，何以他們的傳說就記著，而夏商的就忘掉呢？

第五，萬一再說商周的傳說雖有，而却不是現代所看到的完整系統，現在的古史系統是後來替他們編造的，這也有之，尤其顧君的真意就在這點。但是我們看禹稷契的系統，即如顧君所說明在西周已成立，堯舜在東周，伏羲、神農、黃帝在戰國，可見這個系統，至少有一大半是成立於他們子孫傳說的時代，那裏能說是「後來」？我以為與其武斷他們和他們本來沒傳說，必須「借用」必須「創造」才成，遠不如武斷他們和一切原始民族一樣，不惟是有，而且已早有的近真一點！

第六，假使顧君的武斷頗有理由還可以，但是按照顧君證明他的主張的方法，正有一比，正好比軍閥們戰爭時強行「拉夫」的一樣，不要被顧君發見了一個和古史上帝王相同的名字，若一發見了，無論怎樣也要拉過來，做他的主張，只可憐了那些「偶然以文字記載」古代傳說的人，無端竟被顧君加了一條「偽造文書」的大罪！

其實，古代的歷史，多一半是聰明人製造是偽的，這何用說！若有方法，儘管可以指出那時所記的歷史，不盡合乎那時的事實，完全是虛構的。

〔附錄〕像古史辨這樣複雜的兩冊書，要捉住他的方法來批評，我自知道是很危險的，以上的批評，也許還有未捉住的很多，那末我的批評，也許會根本錯誤！不過我若有錯誤，自是應該受的，惟對於古史辨原作者顧先生，若有遺漏了的方法時，我應預先表示歉意！

自從古史辨論一場，有些人覺着上古史太沒辦法，最後主張只有等待「考古學」的發掘，「考古學」方法本來是無疑的好方法，但是若在這時（古書上的古史陷入沒方法整理時）要這樣主張，那考古學的方法，也應另商其實，整理古史本有極好的方法，方法若對，那古書上所有的記載，大半會變成極好的史料！我不敢單單批評顧先生，以後要把這些方法提出來也供大家討論！